

战国时代的重演

(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)

林同济

(一)

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意义。

民族的命运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：不是了解时代，猛力推进，做个时代的主人翁，便是茫无了解，即或了解而不彻底，结果乃徘徊、分歧、失机、而流为时代的牺牲品。

现时代的意义是甚么呢？干脆又干脆，曰在‘战’的一个字。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，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：这乃是又一度‘战国时代’的来临！

说来虽奇怪，却不是无因无缘。历史自有历史的逻辑，快眼可以快发。历史上自成体系的文化，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，不至中途被外力摧残而夭折者，都要经过一个‘战国时期’。在我们中国，则上自吴越战争，下至秦始皇兼并六国，为期约二百五六十年。在希腊罗马史则上自腓尼基战争，下至凯撒时代，为期约二百年。埃及印度各体系的文化，也都各

有各的战国一段落。

欧洲文化，崛起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之后，虽处处显露着希腊罗马的影响，但在整个实质上乃是独立的体系。经过了文艺复兴，宗教改革，地理发现，工业革命的各幕热剧，乃不可遏止地成为现代全世界文明的动力，并且还决定了现代世界史——人类第一次真正的‘世界史’——的发展模型与方式。我们细察二百年来的世界政治，尤其是过去半世纪的天下大势，不得不凛然承认你和我这些渺小体魄，你和我兢兢集凑而成的中华民族，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！我们的时辰八字，不是平凡，乃恰恰当着世界史上‘大战国时期’露骨表演的日子。这段热剧，在十六、十七、十八三世纪早已渐呈雏形，就好象我们的‘春秋时代’在许多方面也都是‘战国七雄’的先驱一般。但真正开幕之期：似可以拿破仑战争为准；充量的揭发，大可能还要包括此后的三五百年。

（二）

战国时代的意义，是战的一个字，加紧地、无惜地、发泄其威力，扩大其作用。

战本来是任何时代都有的现象，并不是战国时代的专用品。战国时代之战，所以大异于其他时代之战者，有三个大趋向在。这三个大趋向，因为各个文化体系的内外在环境的特殊，主观客观条件之差异，当然不免也有和缓与极端发展之不同，部分与充分表现之互别。却是演化的形势以及发挥的作用，大体上都能够绰约相等，旷观中外古今，战国时代之所以为战国时代，战国的战之所以为战国的战者，理由都在这

里。

(一) 战为中心。——每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偏重的中心现象。这个中心现象一方面决定了那时代的‘统相’ Gestalt，一方面也就说明了那时代的意义。宗教时代，信仰中心。经济时代，企业中心。革命时代，社会改造中心。战国时代，战争中心。所谓战争中心者，战不但要成为那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事实，而且要积极地成为一切主要的社会行动的标准。在宗教、经济、革命各时代，战的主要动机，多出于信仰、企业、社会改造等等事实；战的进行，也并不积极干涉到信仰、企业、社会组织等等的主要内容。到了战国时代，战的威胁与需求迫切到一个程度而战乃竟成为一切行动的大前提。社会上一切的一切都要逐步地向战的影子下取得存在的根据。一向所谓信仰、企业、社会改造等等大事情都要逐步地失去独立发展的自主权；战的威力反要加紧地、加速地、取得主动的地位，而积极决定其他一切的内容与外表。

(二) 战成全体。——其他时代的战，性质不免‘片面’。参战员的数目有限，作战物的品类不多。到了战国时代，战乃显著地向著‘全体化’一条路展进。全体化的形势与程度，各体系的文化虽然各自不同，但尽其文化内在条件的可能范围，都一致力求‘人人皆兵，物物成械’。这种气象，在中国的‘战国阶段’就露出相当的规模，既不是以前的封建以至春秋时代所可比，更不是以后的大一统局面下‘雍穆熙和’‘粉饰太平’的一套。在中国的战国七雄中，比较最能彻底推行全体战的，便是秦国。现代所谓全能国家如德、义、等等，都可说是，秦之续’而变本加厉。正所恶作

剧的时代。一方面是投机而生，一方面还要挟时而进的。浅见者流，到了今天还要死把整个全能的组织意义，当作一种专对民主潮流而生的反动而讨论，就好象乎宇宙间森罗万象，除了维克多利亚的民主政体，便没有更重大的事情，而一切历史上的事态变迁都必得拱绕着民主两书而或正或反！真迂泥极了。

这并不是看不起民主，乃是说事到今日，实在险恶到惊人的程度，就是轰动全球一百多年的民主问题也竟然落到次等地位。把占着时代的核心的，乃是‘全体战’三字。有没有本领随时可作全体战，可作‘战国之战’，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，先决条件。

因此，民主政体应有不应有，再也不是你谈哲理上较长比短所能决定；真正关键，全看民主与全体战的关系如何。而这个关系，也绝不是形式政论者所能先验预断；真正关键乃在乎一个民族对其所惯有的政体实际运用的活力，应变的机能之如何。民主与全体战本不必有先天注定的冲突，在某些意义下，可说正是全体战的一种好条件。这点将来再论。此刻所要指明的：时代意义的核心，必须先切实把握。目前的若干全能国家，尽管他们发言代表人如何解释，在客观的基本历史作用看去，说是为了要民主而全能，毋宁说是要全体战而全能——就仿佛商鞅废井田，改税法、抑贵族、明赏罚、目的要把秦国彻底地变成个道地的战国时代的国家，那里是要硬硬然拿着‘反封建’来当他的大前提。

‘一切为战，一切皆战’这是全能国家的根本历史意义与作用。我们要知‘时势’，用不着再捧出那班实验派的专家，请他们调查统计，来一五一十地在纸上苦作推敲。但看

十数年来全能国家跟着一个呱呱坠地，我们可以无疑地判断天下大势是不可遏止地走入‘战国作风’了。

（三）战在歼灭——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战国的战，最惊人的色彩在这里；战国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最无情的作用也在这里。

战有两种：一曰取胜之战，一曰歼灭之战。前者的结局，最多也不过赔款割城。后者的结局，则非到敌国活力全部消灭不止。在我们国史上，春秋时代七大战都是属于前者。吴越战争，开始露出歼灭的倾向。到了战国时代，便愈战而愈显出歼灭的本色。齐桓公‘与灭继绝’的半封建作风，晋文公‘退避三舍’的贵士豪概，有如岳阳黄鹤一去不返了。

所以然者，春秋时代之战，目的尚在维持国际的均势：大国对大国，只求名义上‘让执牛耳’；大国对小国，也多半只要它‘听命’而不对它‘占领’。到了战国时代，乃有一种崭新的欲望产生——即所谓‘囊括四海，并吞八方’之心了。换言之，就是统治世界的企图。

惟其如此，胜者对败者的要求，绝不是割城赔款所能满足；即使满足，也是暂时又暂时，不转瞬间，‘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’了。如此一次又一次，必到你全部消灭而后已。所以战国时代之战，其特别可怕处，尚不在战之‘多而大’，乃在取胜战少而歼灭战多，不在取胜战少而歼灭战多，乃尤在乎一切的取胜战都是著意地为着歼灭战作先驱！演到最后的一阶段，两雄决斗，一死一生，而独霸独尊的‘世界大帝国’告成。我们古代的国史如此。希腊罗马史也是如此。日前以欧洲文化为基础的世界史，它此后的发展，是否可以独

成例外呢？这只有让时间供答案。目前的事实，是歼灭战已开始展开。

(三)

一个文化，演到某阶段而便有战国时代的来临，并不是偶然之事，也不是神秘天工。物质条件，精神条件发展到相当程度，各区域，各民族间的接触也就日繁，互倚赖，互磨擦的情节也就日多。在那相吸相抵的矛盾境界中，较大的政治组织成为了选辑的必需。并吞的欲望就在这里产生。由欲望而企图，由企图而行动，于是战乃不可先。战到了相当尖锐化，战国时代遂岸然出现于人间！

用战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间，国家间的各种问题，论理是‘不道德’，也‘不经济’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‘仁义派’的孟子与‘功利派’的墨子之反战论，与现各国思想家的和平主义，根本原无二致。无奈理论自理论，事实与事实。向来理论家和平呼声涨得最高之时，也正是战国局面急转直下之顷。好象战国时代的国家每每脱不了战国时代的气质的。它固然也想平心静气来‘解决’国与国间的各种实利问题，但——它更想要逞力制胜，取得独霸独尊的地位。遂地的战国灵魂乃竟有一种‘纯政治’以至‘纯武力’的倾向，充满了‘非道德’，‘非经济’的冲动的。韩非子如炬的眼光早已抓住这点。他所说‘上古竞于道德，中古逐于智谋，当今争于气力’，可算是对战国时代精神，一针见血。斯宾格勒谓此后世，政治第一，最近作家德拉克也高唱‘经济人没落’的一说，都可说是‘见几’之谈。战国的气运，仿佛定命似一般，都要向着‘世界大帝国’一方向拥进；而且所采取的手

段，好象也都不由自主地要出于歼灭战之一途。所谓和平手段，共和方式，在战国时代，侃侃能谈者总比任何时代为多。实际推行的可能性也总比任何时代为少。这不是说和平不‘应该’，只是说战争是‘事实’。

运用全体战，歼灭战，向着世界大帝国一条路无情地杀进——这是战国时代的作风，战国发展的逻辑。如果我们眼下展开的世界史上的战国时代（可把它叫做‘大战国时代’）稍有以异于古代中国或希腊罗马史上的前身的话，那恐怕就是：

（甲）古战国之战，还未能充分发展其全体性；今战国之战，可以本着空前的科学发明以及科学组织法，而百分之百地把国家的一切人力物力向着一个中心目标全体化起来。

（乙）古战国的歼灭方法尚不免粗而浅；今战国的歼灭方法却精密而深入得多。坑杀降卒，收兵铸象，秦始皇的办法也。把迦太基烧成荒墟，片瓦不留，五十万人口所剩下的五万残遗，尽数卖为奴，卖为隶，西比欧的办法也。今战国的作风，则经济榨取之外，还加上微妙的奴化教育。日本则更本着他的‘准武士道’的原始残忍性而推广其毒化政策，从根本上来消灭我们的种族。古今中外，方法确有精粗之别，而其为歼灭，为‘活埋’则同！

（丙）继承古战国而展开的若干‘世界大帝国’其面积究竟不过全地球的一角。今战国的魄力，如果尽量发挥，莫能阻遏，其所形成的大帝国，规模必定广大。详细的过程无由预测。大可能的，也许开始是一种大陆式的若干‘区域霸国’的对峙，最后乃在火拚而成为全世界的‘大一统’

莫谓这种‘大狂妄’绝对没有实现之一日。现在这个由

欧洲文明扩大而成的世界文明，是充满所谓‘浮士德精神’的，是握有一种无穷的澎涨力，无穷的追求欲的。我们‘中庸为教’的中国人，也许对这种大企图，始终难于了解，难于认真置信。尽管我们在报章杂志上也跟着人家大喊，指斥某国某国包藏征服天下的野心，却是许多人的脑子后头总不肯认真相信天地间果会有这般大狂妄，更大大怀疑这般大狂妄会有实现的可能。然而我们这朵地里的妙处，也往往正在你认为‘期期不可能’之中，蓦地涌出一个惊人的‘实现’。成吉思汗，凭着他那种游牧社会的原始工具，还可以霹雳一声，创出来并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，谁能保这个踏进了‘金属混合品时代’的二十世纪科学文明必不会有达到世界大一统之一日！技术的基础，经济的需求，已经开展到一个程度，竟使二三‘狼子野心’的国家不由自主地在那里跃跃试手了。客观条件，主观心理，已经酝酿到初步的成熟。所欠的大恐只是时间——虽然在目前还看不出谁为六国，谁为强秦。

这正是世界‘大战国’的初期。生于斯世，为斯世人。我们所要关心的，尚不在三百年后天下是否‘定于一’。最迫切的，我们要认清自今日起，时代已经无情无地开始了‘战国式的火拚’。这个火拚，不是三年五年便可了事。它乃是代表着一个旷古‘强有力’的文化在演展路程中所势必表现的主要阶段。正所谓时代的中心潮流，其来也有数百年的酝酿，其去也恐怕亦必须数百年的工夫。

(四)

两种程序正在展开着：强国对强国的决斗，强国对弱国的并吞。

目前欧洲战争是前一种程序中的一幕。它的历史作用，和上次欧洲一般，乃是要在西欧的第一陆权国（德）与第一海权国（英）之间，决个雌雄。（法义两国只是配角。）这种海陆权的尖斗，在欧洲地域内早有先例。小则雅典与斯巴达，大则罗马与迦太基，都可说是英德争霸的前身。毕竟欧洲员幅狭小，不容两大并立。打个分晓，好使其中一个跳出世界舞台来，充分自由地表显其身手。英德争霸，正不必在这一次便得到截然的结果。也许再战下去，德霸大陆，英霸海上，海陆权‘两极化’Polarization的相持形势，一时无由打破，只好暂告和平。然而如此和平终是暂的。两国的海陆权越形‘两极化’，两国决斗的需要也必越形迫切。如果罗马与迦太基的争持，前后三大战，为期不下一百二十年，那么，英德战争也大可以时继时续，绵延一二世纪下去。解决时期，远近不可知；终究却必须解决。

这一点，希特勒与邱吉尔都看得清楚的：英德之间，势不两立，不是波斯与希腊之偶尔交锋，乃是罗马与迦太基的你死我活。尽管开战之初也有一般‘人道为怀’的理想家提倡妥协，事实上的无情趋势必要向歼灭一条路推进的——就好象罗马当日也有那西卡一般人主张保全迦太基的命运，而实际上罗马兵团还终究把迦太基扫荡得片瓦不留。历史的逻辑有时竟有这般铁版似的。

英德两国终必要互相歼灭，因为所争的目的终乃在世界霸权。惟其如此，他们这次战争自始就是一种“世界战争”的性质。现代世界政治的演变，主要发动力究竟还在欧洲。英德之间，谁胜谁败，绝不能是一个‘纯欧洲’的问题。战争延长愈久，引起的国际问题必定愈多。到了后来，“非欧

洲”的列强参加混战，也许是不可免的事实。

强国对弱国的吞并，由日本侵夺我们东北以后，有如狂风暴雨一阵阵地连卷起来。自东北四省、而阿比西尼亚、而澳大利、而阿尔比尼亚、而捷克、而波兰、而芬兰、……其意义都是一样的。并吞弱国，在战国时代，不只是一种恃大凌小的表现，乃尤其是强国对其他弱国争霸的一攻势或守势的必要步骤与准备。先下手者为强，后着鞭者失势。强与强国竞争愈急，‘强侵略’的战争必愈多；而这种强侵略的战事尤非达到全部歼灭之一步不止的。

这次日本对我们侵略，可算是强弱的程序中最重要的一大幕。它自始就充满了歼灭战决心的。有一点甚特别，与一般的‘强侵略’的形势大大不同；就是日本这次来侵，不但被侵略的国家（中国）生死在此一举，即是侵略者（日本）的命运也孤注在这一掷中！此所以日本对我们更非全部歼灭不可，而我们的对策，舍‘抗战到底’再没有第二途。

歼灭战是无和可言的。一般败北者所称‘天下无不和之战’对春秋时代的取胜战而言，勉强可通；应用到这次日本对我们的歼灭战，便是妖言误国。战国式的歼灭战，根本无和，和便全体投降，男为臣，女为妾！偏偏有一辈惯为臣妾之徒，以为天地间总有侥幸可图，只须号泣走敌廷，三跪九叩，人家即可‘放松’饶命。傀儡心理，文人政客鬼胎，真贱极无聊了！

（五）

最后，让我们提出两三点，大家必要认清：

（一）不能战的国家不能生存。——战国时代来到，再

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躲避开灭战的尝试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小国弱国终没有幸存的余地；即是幸存，也不过我们‘战国七雄’时代的宋、鲁、对当时的大政治，毫没有过问的资格，危坐着火山边际，永远战战兢兢，到了最后一顷刻，人家挥刀，他们只有引颈就戮而已。这乃是无情的时代，充满了杀伐残忍之风。却也是伟大的时代，布遍着惊人的可能。惟其无情，所以伟大。惟其伟大，所以无情。人类的大运所起，竟已借乎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中国人作最后的决定——不能伟大，便是灭亡。我们更不得再抱着中庸情态，泰然捻须，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！

(二) 左右倾各字样，意义全消。——左倾，右倾两名词，到今日原来已成为过时的花样。在战国作风未到露骨表演的时辰，国家内部的各社层，各阶级，还可以有尔诈我虞，相倾相轧的闲工夫，闲机会。所谓左倾右倾各字样有他们的现实背景，也有他们的社会作用。到了今天，世界大政治的演变乃早已把这两字样当日的涵义，根本取消，而微妙地翻手一拍，转变成国际纵横俾阖的一种纯工具！用旧日的眼光来看，目前名国中，最左的当然是苏联，最右的当然纳粹德国；然而把这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平心相较，却比其他任何国都近似得多。各义上，为国际策略的方便起见，彼此仍可自命为左，自命为右；实际上整个世界的中心潮流，迫于时势的需求，只能有朝着一个方向推进的——就是如何建设道地的‘战国式’的国家，如何把整个国家的力量，组织到最高度的效率以应付战国时代势必降临，势已降临的歼灭战，独霸战。叫做社会主义，共产主义也好，叫做法西斯主义，纳粹主义也好，甚至和缓共词，叫做代议会全能主义以及罗斯福

新政策也好，根本的动向却都是‘殊途同归’，实际的结果我看都不外是‘国产主义’的完成。完成的速度与形式，因为外环境与内在传统之不同，不免各国各异；但完成的必然愈演展必要愈显明。

因此，十年来满耳哦哦的政论，苦把意识形态的对垒——民治对全能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等等——来蹉蹉然解释国际的合纵连横，根本上就等于捕风与捉影。前期的意识形态再也吻合不了现实的事实。如果有一些国家依旧应用着那些老名词，那也是完全把他们当做战国作战的工具。合用则高唱高举，不合用则如履弃捐。如果他日时移事迁，弃捐的仍可再用。你和我若还把这一套认真看待，那就未免‘太书生’了。

（三）中国文化的发展，早已踏过了它的战国阶段而悠悠度过了二千多年的‘大一统’的意识生活。我们中国人的一般思想立场，无形中已渗透了所谓‘大同’局面下的‘煖带轻裘’，‘雍雍熙熙’的懒散态度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不免时时刻刻高提着‘大一统’时代的眼光来评量审定‘大战国’的种种价值与现实。从上次欧战后之高歌‘公理战胜’，以至九一八之苦赖国联，其思想都出于一条的路线。置身火药库旁，却专门喜欢和人家交换‘安详古梦’这恐怕是我们民族性中包含的最大的危险。

大同可以为人们最后的理想。‘战国’必须是我们人手的途径。要取得谈世界和平的资格，光栽培出能作‘战国之战’的本领。

象征的说法，我们须要‘倒走’二千年，再建起‘战国七雄’时代的意识与立场，一方面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，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多年来的祖传文

化！

战国策半月刊创刊号，二十九年四月。

（录自《战国策》创刊号1940年4月，又见《文化形态史观》第78—95页，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）

政治观：外向与内向

（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）

何 永 信

政治观，即国家观。而甚么是国家？国家所以异于其他社会团体的在那里？

世界历史上最聪明的民族，希腊人，早就备有答案。他们以为国家之所以为国家，其他社会结合所以不成为国家的，在它为一切人群结合中唯一具有“作战权”的团体，有此则成国，无此则非国。这个“作战权”为国家所独有，为其他社会结合所无，它们也许有作战之实，而无作战之权。国家有权对任何团体作战，那怕是国外之他国，或国内之社团；其他社会结合，如对内作战，则为叛逆；对外作战，则为擅动。作战之权实俱有的，只是国家。抓住这个要点希腊人与后来的欧美人，就从此发挥他们特有的政治思想。无论是明讲或暗示，他们的国家思想，大体上，（有时间和例外）都以“战”之概念为中心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国家乃在战争中及为战争而存在。一切政治，经济，文化，教育，科学等等设施，有意无意，都是以“战”为最后决定之因子。譬如美国某州，欲修一条公路，表面上虽是区区一条路，但事前除须得该州的公路局允许之外，须先得美国中央政府参谋部的批准，为的是公路与国防有密切关系。这种敏锐的“战意识”，在欧美各国人的脑筋中，甚为普遍，推其源，实希

腊人发端。希腊哲人希路卡拉塔士（Heraclitus）有一句名言，千古传诵，“战争为万事之父”！

这种思想，与支配中国政治的儒家正宗哲学，多么不同！儒家满口讲仁义，讲道德，讲尧舜，讲谐和，讲大同，充满了“雍雍和和”的气象，无半点“战争意识”。孔子于食，兵，信三样宁肯不食，宁肯无兵，而不肯失信。这种道德观，是我国的长处，也是我们在现世界中的吃亏处。法家很可以反驳道：“无食则死，无兵则亡，人而死亡，信于何有？遍览中国政治历史，惟法家思想近于希腊。战国时的商鞅说得好：

“国有礼，有乐，有诗，有书，有善，有修，有孝，有弟，有廉，有辩；——国有十者，上无使战，必削至亡。国无十者，上有使战，必与至王。国用诗、书、礼、乐、孝、弟、善、修、治者，敌至必削；敌不至必贫。国不用八者治，敌不敢至，虽至必却。与兵而发必取，取必能有之；按兵而不攻必富。国好力，以难攻；国好言，以易攻。国以难攻者，起一得十；以易攻者，出十之百。”（商君书，去疆）

商鞅把国家一切的一切，归结于战争，犹如生理学家把人体一切的一切归结于“生命力”。这种“战意”多么浓厚！与希腊西洋政治思想多么吻合！假如亚理士多德被称为西洋的第一个法西斯主义者，商鞅可称为中国的最先的“全能主义者”。

我们用不着品定这两种思想——儒家与法家——的高下，两只须问那一种对于我们较为适合时代的需要。儒家政治思想自有其时代的原因；秦汉以降，法家所促成的大一统

局面告成；中国除在几个外族侵入的危机外，所需的是雍雍和和的儒家，而不是法家。现在不同了；中国已不是“大一统”的“世界”，而是在紧张严肃的世界角逐中的一员。这世界尚无“大一统”的象征，春秋战国时代的一切，可于现在世界见之。也许全球将来可有“大一统”，但现尚茫茫不知何日；中国至少有几百年要在战国日子里过。

我常以为政治思想，中外皆然，有一个共同的缺憾；即未把两种战争认识清楚，这一种我无以名之，名之为“胜利而战的战”（War-for-Victory）。另一种是“为消灭而战的战”（War-for-annihilation）。有一朋友告诉我。美国政论家李比民氏（W. Lippmann）亦有同样的分别，前者他名为“局部战”（partial War），后者他名为“全体战”（Total War）。我没有看见原文，不知他的意思是否与我完全吻合。我的意思是：前者为只把敌打败就罢手的战争，打败者须割地，须赔款，须认胜者为盟主；春秋时代很多战争，如所谓“五霸”便是，十九世纪也如此。这种战争，可以防止，可以消弭于事前，可以调解于事后。可以用国与国间之组织，来作干旋人。后一种战争，为“你死我活”的战争，其目的不只把敌人打败，而在把敌人消灭。其表现不在割地，不在赔款，而在根本毁灭对方，简直是“有你无我，有我无你”的一种战争。这种战争，是不能防止的，不能调解的。中国的战国时代，西方罗马帝国将成之前的时代，都是好例。目前也是这种战争开始的时期，此之所谓“大变动”。

为什么把这两种战争分开？因为不分，就弄出许多徒劳无功的错误。譬如国际联盟，就是一例。国联理论的基础，

以为所有战争，都可以防止，所以立盟约，盖房子，开大会，扰攘了十几年，闹来闹去，毕竟是一套空谈，一个纸老虎！我国又以为真，在拉西曼氏甘言悦语下，依靠国联，以为国联真可以助我，结果是大失望！假如我们早把这两种战争分清，看定现实，何至有今日的拼壁？又如有些人也不把这两种战争分清，以为现下中日之战，与甲午中日之战一样，同是“为胜利而战的战”：听见近卫“不割地不赔款”的宣言，即色然而喜，以为可以讲和，高唱“天下无不和之战”的口号。谁知“不赔款不割地”，正是“为消灭而战的战”之特征，正是整个吞灭中国，消灭中国的别名。这些人犹以为可以讲和，真是荒天下之大谬！有一身为学者，曾充其大学教授多年的先生，也不懂这点，贸然去上海，落了陷阱后，始知日人之不易与，仓皇走出。其实他如把这两种战争分清楚，早就应该知道：在现的第二种战争中，日人的条件不会好的，应该不待“失身”后，然后知道。这可见分开这两种战争，极端重要。

认定战争为国家最后的精义，时时刻刻想着国与国间是不断地斗着或明或暗的战争，而将国内一切的一切，置于这个大事业的最高总驭之下：这种看法，我们无以名之，名之曰外向，或大政治（High politics）的政治观。反之，认国家为一种“雍雍和和”的“大一统”，所谓政治，不过是升官发财的追逐：某人作部长，则色然而喜，以后我可以获得司长参事的一官半职；某人卸任，则戚然而忧，以为我的饭碗不保了；整个国家，无非是为他个人玩“升官图”的棋盘：这种看法，我们名之为内向或“升官图”的政治观。

“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。由这两种政治观的不同，就